
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 考古学观察^{*}

陈洪波

摘 要: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秦汉时期。这三个阶段,可以从文化、族群和政治三个不同侧面观察和理解。其中,族群的迁徙和融合具有根本意义。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文化的历程,从距今大约五千年前起步,经过青铜时代的革新,到秦汉时期终于完成。岭南地区的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核心区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岭南社会固有的土著因素,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多支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创新过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岭南地区 中华一体 边疆考古

一、问题的提出

岭南,是对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岭南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各朝代行政建制不同,对于岭南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区别。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岭南主要包括今中国广东、海南全部,广西大部 and 今越南北部,珠江中下游是其核心区。岭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由东至西绵延一千多公里,形成天然屏障,分隔南北,再向南则是大海和热带雨林,又是另一番景象。这种

陈洪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华南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 hongbochen@qq.com。

^{*}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进程的综合研究”(23BKG007)阶段性成果。

地理环境的独立性,构成了岭南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底层基础。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世界重要农业起源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公认的突出贡献。正是在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得以起源、形成和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核心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有一个逐渐纳入中华一体的过程。就岭南而言,考古界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以赵辉、李岩、张强禄、郑君雷等学者的论述最有代表性。赵辉最早提出了岭南文化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问题。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岭南地区和北方地区一直存在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总体来说,越至后期来自北方文化的影响越强烈,到了秦汉时期,则与来自更北方的黄河流域的中央王朝直接发生了联系。总之,这个过程和现象可称之为岭南文化的“中国化”进程。^①李岩、张强禄主要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细致讨论了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他们认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地处“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之际,包括文化面貌和生计方式极具多样性的“百越”文化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郑君雷撰写了多篇论文,探讨了岭南地区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对于认识边疆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有普遍性意义。^③

以上学者的论述,其研究对象和时段各有侧重。本文拟从长时段考古资料出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整体考察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过程,探究其深层次动因和具体特征。下面主要以两广地区的考古资料梳理这一过程。

二、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地区农业经济的传播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有自己的特点,陶器和磨制石器出现很早,食物生产现象出现也很早,但并没有产生真正的谷物农业,块茎作物系统是否形成,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证据。^④就考古发现而言,岭南地区成熟的稻作农业来自长江流域,明确的传播路径至少有两条,即广西北部来自长江中游的稻作传播,和广东地区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传播。^⑤

① 赵辉、李岩:《石峡遗址与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博》2022年第4期。

②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2021年第2期。

③ 郑君雷相关论述可参见其文章:《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边远地区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学论纲》,《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3期;《帝国及其边疆:汉帝国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整合》,《古代文明》2023年第17卷;《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人民论坛》2010年第35期。

④ 赵志军:《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甌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6页。

⑤ 陈洪波、管葳:《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南方文物》2023年第1期。

(一) 广西地区稻作农业的传入

广西地区现知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桂北山区的资源晓锦遗址,在 20 世纪末期被发现和发掘。该遗址的遗迹与遗物都表现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农业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30000 多粒炭化稻米,包括粳稻和籼稻两种,属于较为原始的驯化稻。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测年为距今 5000—4500 年。^①

资源晓锦遗址的发现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存在一条沟通南岭南北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的通道。晓锦遗址地处越城岭腹地,水系虽然属于长江流域,但地理环境属于典型的华南山地。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属于华南狩猎采集文化圈,和南岭以北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文化在经济性质上截然不同。晓锦遗址出土的原始栽培稻,是岭南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这里的水稻显然来自长江中游地区,自水系上溯于此。而长江中游考古发现的原始栽培稻遗存是东亚地区稻作的源头之一,如湖南省澧县彭头山和澧县八十垱遗址所发现的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距今 8000 多年甚至更早。^② 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则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田,距今 6000 年。^③ 从水稻遗存的年代和类型来看,晓锦遗址的水稻具体来源应该是资水下游平原的稻作农业文化。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看,晓锦遗址第一、二期陶器特征也表现出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陶器的相似风格。^④

晓锦遗址仅在第二期发现了 3 座墓葬,发掘简报只报道了 M3 的具体情况。M3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底平整,长 180、宽 50、深 64 厘米。随葬 2 件陶釜和 1 件陶碗。陶碗摆放在人骨两侧,其中有 1 件陶釜仅存上半部分。很明显,这种葬式应该是仰身直肢葬。我们知道,自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土著文化流行的是和平文化大传统下的屈肢葬,这在广东英德青塘、广西白莲洞、甑皮岩、顶蛳山等遗址中都有类似发现,这种屈肢葬(包括同类的屈肢蹲葬甚至肢解葬)被认为属于华南和东南亚土著澳巴人种的葬俗,和亚洲农人流行的仰身直肢葬有根本区别。^⑤ 晓锦遗址仰身直肢葬的发现,说明亚洲农人已经进入岭南澳巴人种的传统领地。

稻作农人到达资江源头之后,水路已经走到末端,但这里距离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源头和寻江源头很近,他们只需要走很少的陆路便能进入漓江或柳江,然后继续沿江而下,通过西江干流,最后到达珠江三角洲。这是从高庙文化时期就存在的一条文

① 何安益、彭长林、刘资民:《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3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资源县文物管理所:《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 2006 版。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6 期。

④ 何安益、彭长林:《从晓锦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与珠江流域地区原始文化的交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第 315—321 页。

⑤ [澳]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杜芳芳译:《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与人类迁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05 页。

化和人群迁徙的通道。

事实上,在邕江流域的顶蛳山遗址第四期,就发现了稻作农业的迹象。在遗址的第 3 层,禾本科植硅石的比例突然上升到高达 99%,很可能是稻属植硅石加入所致。顶蛳山遗址的前三期均没有发现稻属植硅石的踪迹,到第四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稻属植硅石,且其形态基本上都属于栽培稻,说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类型,即稻作农业,而且规模较大。^① 对于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当是反映了外来稻作农业人群的侵入。

顶蛳山第四期的年代,原报告定在距今约 6000 年,但是张弛、洪晓纯根据器物形态判断,顶蛳山第四期,包括桂北的晓锦第二期,年代都不可能那么早,应该接近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约距今 4500 年。^② 晓锦和顶蛳山第四期都是同一传播链条上的产物。这条传播路线的存在,早在咸头岭文化时期已经有所表现。

咸头岭文化分布在环珠江口一带,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咸头岭文化的陶器,特别是彩陶和白陶,与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陶器风格类似,二者当有渊源关系。其传播途径,最大的可能当是西江水系。广西平南石脚山遗址出土了白陶和白衣黑彩陶,平乐纱帽山也出土了不少高庙文化风格的陶器和石器,这两处遗址的发现,连结起了长江中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条文化传播路线,很可能是由沅水到桂北,然后经过漓江、桂江、西江,最后到达珠江三角洲。^③ 咸头岭文化和高庙文化的联系,说明沟通长江中游和珠江中下游的这条路线在距今 7000 年已经存在,距今 5000 年之后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和人群的涌入,仍然利用了这条传统的传播路线。

(二) 广东地区稻作农业的传播

广东地区稻作农业传入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尤其是石峡文化和岩山寨的发现,再加上珠江三角洲的零星资料,将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稻作农业的传播路线清晰地揭示出来。

在距今 5000—4000 年,水稻已经在粤北山地种植和消费,^④ 石峡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了石峡遗址外,在粤北和粤西也发现了不少同类遗址。

石峡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而得名。1973 年、1975—1978 年由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1660 平方米。根据石峡遗址 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⑤ 遗址堆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堆积较薄,可能是粤北

① 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考古》2005 年第 11 期。

② 张弛、洪晓纯:《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 年第 3 期。

③ 贺刚:《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④ 杨晓燕等:《稻作南传: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2018 年第 1 期。

⑤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版。

的土著文化,未见石器。第二期即石峡文化,大约距今 4800—4400 年,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文化。在同时期的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石峡文化一枝独秀,在农业发展、工艺技术、精神生活、军事实力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石峡文化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玉器等。陶器有夹砂和泥质陶两种,多呈灰褐色或灰黄色,另有灰、黑、红、橙黄陶等,白陶仅发现 1 件。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平底器极少见。主要器形包括盘形鼎、釜形鼎、盆形鼎、釜、圈足或圜底罐、壶、瓮、三足或圈足盘、豆、罐,还有少量甗、大袋足鬲、杯、盂等。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约占 70% 以上。纹饰以绳纹、刻划纹、附加堆纹为主,圈足上常见由大小圆孔、椭圆孔组成的镂孔装饰。石器种类繁多,且制作精致,多数通体磨光。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多样,包括长身弓背两端带刃的镞、长身铤、梯形铤、有段铤,以及磨盘和磨棒等。武器包括石钺和石镞等,以石镞的数量为最多。作为礼器和装饰品的玉石器有琮、璧、瑗、璜、环、玦、锥形器、绿松石片等。石峡文化的玉石器和陶器呈现出明显的良渚文化特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良渚文化南下形成的一支移民文化。^①

石峡文化的墓葬发现 100 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坑的四壁经过烧烤,有的墓底涂抹一层草拌泥。墓葬包括一次葬、二次葬和一次已迁出葬,而以二次单人葬为主,反映出石峡文化埋葬习俗流行二次葬。人骨多已腐朽,一次葬基本上是头东脚西。很明显,石峡文化采用的是亚洲农人典型的仰身直肢葬,和青塘、白莲洞、甑皮岩人等岭南土著澳巴人种流行的屈肢葬完全不同,石峡居民当是从北方迁徙而来的亚洲新石器农人。

石峡文化的经济方式是典型的稻作农业,在遗址的文化层、窖穴、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经过鉴定,石峡的稻谷都属于栽培稻,有籼型稻和粳型稻两种,以籼稻为主,构成情况与晓锦类似,也来源于长江流域。结合遗址中出现的较多农业生产工具,证明当时种植业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早期鉴定结果认为,出土稻粒中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大小不均,可能反映出当时品种纯度较差,说明稻作技术比较原始。^②

岩山寨是近年来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岭南地区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探索岭南史前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该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镇,是一处石峡文化聚落,功能分区明显,遗存丰富,发现了大量的房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石器特别是玉器,表现出显著的良渚文化风格。^③

从粤北山地继续向南,到达珠江三角洲,这里也发现了农业迹象。广州黄埔茶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11 页。

② 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 年第 7 期。

③ 刘锁强:《从石峡到岩山寨:广东先秦考古理念与方法的世纪探索》,《文博》2022 年第 4 期。

遗址和甘草岭遗址明确发现了栽培稻的遗存,表明了史前文化的传播和人群的迁徙现象。例如,李岩和张强禄认为,距今4600—4200年期间,也就是石峡文化中晚期阶段,岭南地区以琮、钺、环、镯等玉石礼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因素的出现,背后是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①

从2017年8月15日开始至2018年1月26日结束,广州茶岭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113平方米,共布设探方(沟)46个,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174座,灰坑111个,窖穴19个,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500多件。其中,距今约4500—38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均为窄长的竖穴土坑墓,大小、深浅不一,绝大多数都是东西向排列,少量为南北向,茶岭平坦的岗顶是墓葬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②甘草岭遗址距离茶岭遗址很近,发掘基本同时进行,发现的遗存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为主。^③

甘草岭与茶岭两处遗址都属于石峡文化中晚期,陶器和玉器带有浓厚的石峡文化风格,但墓葬资料体现出的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石峡和岩山寨,说明这里属于文化传播的远端。

茶岭遗址和甘草岭遗址都检测到水稻植硅体,结合考古测年来看,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和甘草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这是迄今为止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最为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④

综合以上资料,石峡、岩山寨、茶岭和甘草岭的发现,明显可以串起一个文化传播链条。这些古代族群很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出于某种原因南迁,在距今5000年前后翻越了南岭来到粤北山地,形成了石峡文化,然后顺着北江及其支流渐次南迁,最终到达了珠江三角洲一带。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的“龙山化”过程

北方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及人群向岭南的进发,无论是广西方向还是广东方向,都发生在距今大约5000年,这也是中国史前文化龙山时代开始的时候。对于龙山时代发生的文化统一现象,张光直称之为“龙山化(Lungshanoid)”。^⑤虽然这个词主要用来解释中国文化核心区的社会变革,但也可以用之于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历史性变迁。

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天然具有扩张性,这是由其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农业经

①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2021年第2期。

② 张强禄:《广州市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0页。

③ 张强禄:《广州市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9年)》,第360—361页。

④ 夏秀敏、张萍、吴妍:《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1期。

⑤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114页。

济方式会带来人口暴增,在生产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新增人口则需要更多的土地。越来越多的人口终会超过文化原生地的土地载能,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人口向外迁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核心区,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到距今 5000 年前后,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节点,这是张光直所称“龙山化”开始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时期。

农业的传播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文化传播(cultural diffusion)(如采纳、借用和文化适应),另一种是人口扩散(demic diffusion)(族群迁徙)。^① 总体来看,“龙山化”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农业文化传播,更多的是农业人群迁徙。

许永杰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注意到,在距今 5000 年前后,中国的史前史进入了大动荡时期,文明因素纷纷涌现,各支考古学文化出现了大迁徙现象。^② 就南方地区而言,大约从距今 5000 年开始,农业人群南迁,逐渐占据岭南及中南半岛,开启了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一个历史进程。

就目前资料而言,来自长江中游的文化对广西的影响不甚清楚,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对广东的影响则比较清晰,但两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传播范围不限于岭南。从长江下游到广东和广西,再穿过今越南北部低山地带,经红河三角洲,然后继续向南直到泰马半岛,这是一个持续了近两千年的文化传播和移民迁徙过程。

农业社会的“龙山化”扩张,主要形式并非类似历史时期秦汉王朝征服岭南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史前时期,社会内部处于弱势的群体被迫外迁,人口数量一般不大,多是小规模的断续活动。一般来说,迁徙群体到达新的环境中,需要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能延续发展,二者融合的结果,使得文化面貌呈现出地方类型的特点。由此,迁徙之后的文化不可能与原生地一模一样,而是存在必然的差异,有时候甚至会面目全非。新的文化形态不仅仅是器物和习俗的改变,甚至人种和语言都会发生变化。^③

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化”,是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开端。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多支龙山文化。岭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仍然保持了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来自中国腹地的新石器时代农人,在距今 5000 年时进入岭南,用了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将岭南改造成为农业社会,彻底改变了岭南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堪称是岭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初过程。

① [澳]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杜芳芳译:《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与人类迁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38 页。

② 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③ 陈洪波、管葳:《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南方文物》2023 年第 1 期。

三、青铜时代岭南地区百越社会的形成

(一) 岭南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严文明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提出,中国历史从龙山时代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铜石并用时代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① 龙山时代晚期中国境内已经有很多零星的铜器出现,但真正的青铜技术可能来自欧亚草原,最早为夏王朝吸收和二次创新。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一直以兵器、工具等实用器为主,但中国夏商王朝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创造出了以大型容器和乐器等礼器为代表的灿烂的青铜文明,并延续到西周,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现象。这个过程,许宏称之为“东亚青铜潮”,代表了中外冶金术交流史的第一次浪潮,在技术演进基础上精神层面的创新,实现了青铜技术的“中国化”,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得以走上一条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②

夏商时期的“青铜革命”,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同时期其他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其他地区的文化有自己的演进路线。例如浙江一带兴起了原始瓷,中国南方流行印纹陶等。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族群特征上也反映出来,华夏、东夷、苗蛮上古三大民族集团的划分就是依据于此。在中国南方,典型表现就是“百越”的形成。《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③文献中有记载的百越分支包括于越、瓯越、闽越、扬越、山越、南越、西瓯、骆越、越裳、腾越、夔越等族群。岭南土著主要是南越、西瓯、骆越三大部族,西瓯、骆越主要分布在广西,南越主要分布在广东。这些人是亚洲新石器时代农人进入岭南之后,经过与土著澳巴人种的融合,长期演变而成的岭南本土居民。

这个时期,除中原之外,岭南以及其他地区并不是没有青铜文化,但追根溯源,皆来自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出现,代表了这些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当然,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也存在二次创新,而且有时候是重大创新。例如,南方民族使用青铜器铸造权力重器铜鼓,其意义并不逊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发明。但无论如何,青铜技术本身,以及使用青铜器来彰显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意识形态,是来源于中原王朝的。所以,探索青铜器在岭南地区的出现、传播和分布,是认识青铜时代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主要途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岭南族群走向“中华一体”,和龙山时代的“龙山化”有巨大差异,其主要内容并非是以移民为核心的农业社会迁徙,而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即对北方中国王朝思想和文化的吸收。尤其到了周代,随着西周的统一和礼乐制度的形成,对四夷产生了巨大的文化优势,同时通过迁徙、换姓、分

①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② 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世界历史评论》2021 年第 1 期。

③ [汉]班固:《汉书》卷 28《地理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69 页。

封建国等方式,不断向外辐射,百越民族受到周代青铜文化的深度影响,自身也演变为融合其特色的青铜文化。^① 因此,这一阶段的岭南社会进程,主流是岭南土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但这个过程也表现出岭南越人对中土文化的选择性吸收和再创造。无论如何,这种过程都导致了华夏与百越在文化上的一致性,明确体现出岭南地区中华一体形成的历史趋势。

(二) 先秦时期广西地区的瓯骆文明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境内的主要是西瓯人和骆越人。一般认为,西瓯和骆越是越人的两个不同支系,西瓯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大致在左江-右江-邕江流域至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②

先秦时期,在桂东北和桂东南地区存在不少几何印纹陶器,陶片大部分是泥质硬陶,纹饰以拍印的云雷纹、曲折纹、夔纹、米字纹、方格纹为主。先秦时期的几何印纹陶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广西、广东等地,也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的地带,是越人的典型遗物,代表了与中土不同的文化系统。广西的几何印纹陶,主要应该是西瓯的遗存。骆越的典型陶器不是几何印纹陶,可能是夹砂陶,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元龙坡古墓群和附近的岩洞葬,出土器物均为夹砂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三足器极少。正是因为骆越分布区不属于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区,所以很多人认为,骆越实际上不属于百越,而属于濮人系统。^③

西瓯和骆越的分布区也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但在商代只是零星出现。到西周以后,西瓯和骆越吸收了中原的青铜技术和礼制思想,创造出了自己的青铜文化。这时期岭南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具体表现为“百越化”,即以百越自己的方式呈现中国的青铜文明。

西瓯和骆越的青铜文化是在岭北的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器物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表现。广西地区先秦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常见云雷纹、乳钉纹、蟠虺纹、夔纹、窃曲纹、垂鳞纹等,这些纹饰显然属于中原文化风格。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也与中原一致,广西地区采用全范法制作个体较小的实心器,采用内模外范法制造形体较大、胎壁较薄的空心器。在器物造型风格方面,中原文化因素影响更加明显,有些器物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有些则可能是学习中原的青铜技术仿制而成的。^④

有一部分青铜器,如甬钟,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但装饰花纹有浓厚的地方色

①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2021年第2期。

② 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③ 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5页。

④ 杨清平:《东周时期两广地区瓯骆墓葬文化因素浅析》,《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彩,有的正背两面的装饰花纹繁简不同,有的正面装饰花纹,背面则光素无纹,表明是当地的仿制品。还有如广西柳州博物馆收藏的青铜角形杯,从形制到纹饰都很奇特,在中原从未发现过类似之物,纯粹是本地产品。这说明,到西周时期,广西一带的土著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是以引进中原工艺技术为起点,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铸造出的青铜器,无论在器形还是在纹饰方面,既具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又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①

(三) 先秦时期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

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广东一带的越人族群是南越,也是由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族群发展而来的。广东的南越人最具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同样是几何印纹陶,另外还有原始瓷。

广东先秦几何印纹陶最典型的是夔纹陶,流行年代相当于商周时期。目前发现夔纹陶遗存的遗址与墓葬大约有二百多处,中心地区位于韶关、广州、惠阳一带,典型遗址有石峡上层、博罗县铁墟场遗址、广州暹岗遗址等。从数量品种、纹样种类、拍印技巧、烧造技术等多个方面来看,夔纹陶阶段都是广东地区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巅峰。这一阶段常见陶器与青铜器共出,说明其与中原传入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② 广东先秦时期的原始瓷也极具地方特色,在惠州、东莞、增城的梅花墩、银岗、横岭山、浮扶岭、猪枯岭等遗址均有发现。原始瓷常用釉料分为两种:一种以钙、钾和镁为主要成分,呈绿色;另一种则以钙为主,含铁量较高(高于5%),呈黑绿色,最早出现在广东韩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釉陶上。^③

广东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是博罗横岭山,堪称是广东南越族群文化的集中代表。该遗址主要是墓地,位于博罗县罗阳镇黄庄村的东南面,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于1999年发现,2000年发掘面积8500平方米,清理墓葬332座,其中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墓地从商周之际延续到春秋早中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这是广东地区迄今为止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陶片,纹饰包括方格纹和夔纹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完整器物,包括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铜甬钟是首次在广东周代墓葬中发现。横岭山在商代已有墓葬,至周代成为一处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当是方国墓群所在。文献中缚娄国的地望在今惠州、博罗一带,商代已经建立,横岭山可能是缚娄国的一处重要墓地。秦平百越,在缚娄地界置博罗县,后改称博罗县,当在此处。横岭山墓群集中出土了几何印纹陶、原始瓷和青铜器三大类土著和中原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可知这是一处

① 覃芳:《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及工艺艺术》,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

②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207页。

③ 李岩:《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大背景下的多样性格局概论——兼谈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全洪主编:《广州文博(13)》,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第36—38页。

文化交汇之地,最能体现广东先秦时期百越化的特点。^①

先秦时期广东的青铜文化也是外来的,后来得到了有限的发展,发展程度低于广西的西瓯和骆越。卜工认为,广东的青铜时代可分三个大的阶段,早期是未见青铜制品的时期,中期是舶来的青铜制品时期,晚期是土著的青铜制品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属于春秋战国时期。^② 岭南先秦时期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夏商之际的石峡中层时期,西周春秋时期的夔纹陶时代,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时代。石峡中层时期属于简单社会阶段,此时是土著文化格局的封闭式发展态势,以攫取性的渔猎采集经济为主,未出现贫富分化和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夔纹陶时代属于初步分层社会阶段,此时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早期青铜文化,经济形式为农耕和采集狩猎并存,手工业开始专门化,出现了贫富分化和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礼制逐步形成。米字纹时代属于方国社会阶段,此时岭南青铜文化繁荣发展,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部族有固定的疆域,社会分层加剧,军权出现,原始宗教和礼仪产生,战争频繁,出现了军队组织。

以上所述主要是广东地区先秦时期的情况,石峡中层时期实际上已经属于稳定的农业社会,它的延续发展构成了广东北部地区土著文化的基础,夔纹陶和米字纹陶是广东土著的代表性文化因素。在夏纪年晚期或夏商之际,源自中原地区的牙璋等礼器已经通过长江中游进入岭南,但这个时期岭南融入中华一体更具体的表现,则是青铜文化的引进和自主发展。西周之后,典型青铜礼器,如信宜的铜盃,横岭山的越式鼎、钟相继出现,表明在精神领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本地青铜产品。总体来看,广东地区先秦青铜器数量少、种类少、中原风格的少,百越文化特征突出。前期夔纹陶阶段青铜器的来源以文化传播为主,少见族群迁徙现象,到了战国中晚期的米字纹陶阶段,才有不少越国族群南迁,带来了兴盛的青铜文化。

总体观察两广地区的青铜文化,夏商时期遗存中青铜器发现较少,西周以后青铜器才大量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了两点:第一,岭南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吸收中原文化的行为不明显,主要体现在少量青铜器的引进上,西周以后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才加速,这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相符的;第二,岭南之所以在西周以后青铜器才大量出现,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之后本土越人已经掌握青铜技术,岭南有了自己的青铜文化。岭南青铜文化呈现出百越化的特征,而百越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百越化的过程也是百越民族融入中华一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王权政治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南平百越,派发五路大军进攻岭南。《淮南子·人间

^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 2000 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卜工:《岭南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5 年第 2 期。

训》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殪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馀之水”。^① 经过 3 年战争,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国祚 93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汉军平定南越,在秦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除两广之外,还包括了今中国海南和今越南北部地区,皆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北方的文化传播和民族交融是以渐进的、浸润式方式进行的,而秦定岭南和汉平南越,则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的,以疾风暴雨的方式迅速推进了岭南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秦汉对岭南的军事征服,使岭南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央王朝渐趋统一,真正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岭南秦朝、南越国特别是汉代的考古资料极其丰富,要探讨其体现出的中华一体过程,可以从考察这些遗存中的中原文化元素入手。

(一) 秦朝时期

秦朝国祚短暂,有效统治岭南地区的时间仅约 10 年,可以确定的秦朝遗存有限,但都证据确凿,指向秦朝在岭南的活动。

广西地区的主要发现是兴安灵渠,以及相关城址和墓葬。灵渠是秦朝监御史禄率领军民开凿的水利工程,为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兴安一带还有“秦城”,即紧邻灵渠和大溶江的通济城。2013—2015 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通济城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两次发掘面积共约 850 平方米,发现遗迹包括柱洞、水井、水沟、灰坑、散水和瓦片堆积等,出土较多陶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等。发掘者认为,通济城使用时间很短,出土陶器除少量与越文化相关的几何印纹陶之外,大量是具有楚文化特征的泥质软陶如豆、盂、罐等器物,可推断其年代为秦,是秦朝军队进攻岭南时所筑城池。^③ 附近发现的墓葬,如石马坪十一号墓,出土的陶鼎、壶、罐、盒带有战国楚器风格,应为秦墓。^④ 平乐银山岭墓群 4 号墓,出土一件铜戈,长胡三穿,内平直,援上扬,援、胡、内均具有利刃,是典型的战国晚期铜戈。内上两面都有刻铭,背面铭文细如毫发,已经磨花,无法辨认。正面刻两字,也很纤细,一为“江”字,

① [汉]刘安等撰,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全二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090 页。

② 张强禄:《再论秦征岭南与汉平南越境遇之不同》,全洪主编:《广州文博(13)》,文物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1 页。

③ 李珍、秦捷、王星:《广西兴安秦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0—218 页。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石马坪汉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第 238—258 页。

一为“鱼”字,一小一大,互不连续,很可能刻的时间有先后。江、鱼应是戈的置用地名。据考证,江、鱼都是楚国地名,此二字当是在秦军占领江、鱼二地时所刻。这件铜戈应是秦统一岭南战事进行期间埋入地下的,该墓是秦墓。在同一墓地还采集到一件铜矛,通身宽而扁平,脊两侧各有一道血槽,扁圆銎,与秦都咸阳和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秦国铜矛类似。这件铜矛在装柄的筩上并列镂刻“孱陵”二字,是典型的秦篆,因此可以认定为秦代之物。孱陵是秦代黔中郡的一个县,这件铜矛应是驻扎在孱陵的秦军带到岭南战场的兵器,后来随葬地下。^①

位于象州县罗秀镇的军田村古城址,近年来备受关注。2015—2016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城址进行了调查。该城址大体呈正三角形,面积约为15.5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城垣。^②从所处水路通道位置、城址布局、构筑方式以及在这一带采集到的秦半两钱、几何印纹陶陶片来看,指向秦代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是秦军南下构筑的军事城堡。

1962年,广州市东郊罗冈发现两座长方形竖穴木椁墓。^③M4坑底铺垫白膏泥,棺具、人骨架全朽,随葬品有瓮、罐、壶、盒、釜、盘、鼎、小盒等陶器和盘、奩、耳杯等漆器,另有铜戈、铜带钩出土。M3与M4并排,一端相隔0.6米,另一端相连。随葬陶器基本与M4相同,还出土了三弦钮螭纹铜镜和铜铃。这两座墓和广州一般西汉早期墓只在规模和随葬品数量上有差别,至于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等,无不相同。M4出土铜戈上有“十四年属邦工□□戡丞□□□”的刻文,和长沙左家塘的“四年相邦吕不韦戈”相同,可以断定其为秦王政十四年之物,M4的年代可能在秦末。M3的墓葬结构、随葬器物都与M4相同,年代大致相当,但墓葬一壁与M4相叠,可能稍晚于M4。^④

灵渠是秦朝攻占岭南的重要措施,并为中原王朝在岭南的长期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除了这一证据确凿的历史遗存之外,岭南地区的秦代遗物明显具有浓厚的楚式风格,说明秦朝在征服和统治岭南期间,按照就近原则,从楚地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由此楚人和秦人一起,大批进入岭南,构成了岭南社会的上层,诸多高等级墓葬中随葬品的特点说明了这一点。

(二) 南越国时期

广西最重要的南越国时期遗存是贵港罗泊湾大墓,共有两座。一号墓由前、中、后三室12个椁箱组成,椁内有棺3个,底椁板下有7个殉葬坑,也有棺木。两个器物坑则在椁室头箱的底板下,车马坑在墓道尽头南侧,随葬一辆实用的马车。除殉葬坑和器物坑之外,其余部分均已被盗扰。从出土的木牋“从器志”记载来看,原来的随

① 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第200—202页。

②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广西象州县古城址2015—2016年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23年第3期。

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冈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葬品相当丰富。该墓出土罐、盒、甗、釜等陶器 50 件,铜鼓、杯形壶、九枝灯、漆绘提梁筒等铜器 192 件,以及“布山”铭漆器等,墓主人应该是南越国时期桂林郡守、尉之类的高级官吏。二号墓距离一号墓不远,规模略小。前室有车马器,双重漆棺,底板下有一殉葬坑,出土“夫人”玉印、“秦后口”戳印陶盆及“家嗇夫印”封泥等,墓主人可能是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罗泊湾一号墓的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十分相似,随葬品中有大量的汉地产品,文字为汉隶,“从器志”多处提到“中土”,这些都说明墓主人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上层人物。^① 南越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赵氏家族是汉人,高中级官吏大多也是汉人,罗泊湾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广东地区南越国时期的材料以象岗山南越王墓最为重要,墓葬形制与西汉早期诸侯王墓基本相同。中原西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说明南越国的统治者在积极学习中原地区的礼制。南越国最高统治者本是中原人士,在南疆地区继续推行汉化政策,崇奉汉朝典章制度,实为理所当然。^② 南越国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必然会对整个南越社会造成重要影响,从而推进岭南汉化进程。

但是,南越国时期毕竟是一段特殊的割据时期,这段时间岭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与汉文化疏离的百越化现象。这既有南越国统治者团结土著势力的政治原因,也有因为割据造成与汉文化隔离的环境因素。赵佗本人,原是北方真定人,建立南越国之后,执行“和辑百越”的统治政策,不但自称“蛮夷大长老”,而且遵从越俗,“弃冠带”,“结箕踞”。^③ 从罗泊湾的随葬品中我们也看到,中土人士来到岭南之后逐渐越化,随葬品中有铜鼓、铜羊角钮钟、铜筒形钟、铜桶、铜盘口鼎、“越筑”、“越箛矢”等越族器物,都是这方面的反映。这既反映了中原文化和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更是越文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再度兴盛的表现。特别是南越国后期,越人大量进入统治阶层,以吕嘉为首的吕氏家族甚至实际掌握了南越国的国政,越文化更是兴盛一时。郑君雷认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交融的轨迹是“民族意识的越化”和“文化的汉化”,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发展壮大。南越国文化本身已经是汉越融合的“次生”文化,这种新型文化与南越国灭亡以后南下的汉文化再次融合,可称之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次生类型”。^④

刘瑞对华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做了全面统计,发现了不少规律。他通过对各类墓葬、各类遗物的分析发现,在西汉初期的郡治、县治等政治中心内,汉人数量明显占优,但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越人贵族。而在其他地点,不仅越人的数量明显较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91 页。

②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2021 年第 2 期。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 97《郢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697 页。

④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观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多,而且很可能其中贵族的身份要高于在政治中心中的越人。整体来看,该时期越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差不多。苍梧郡、南海郡、桂阳郡原来均以越人为主,但随着汉人的进入,汉越交流快速增长。大体上,该时期苍梧郡越人明显较多,而南海郡则以汉人数量占优。西汉早期遗存比西汉初期有了更快速的增长,特别是南海郡,遗存点数量达到西汉初期的 3.16 倍,说明岭南在南越国时期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南越国的中心南海郡,发展速度最快。^① 南越国对于岭南的开发有重大历史贡献,这与南越国“和辑百越”的汉越融合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

(三) 汉朝统治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将南越故地析为九郡,即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秦和南越国时期,对岭南的统治实行郡国并行制度,苍梧、骆越等土著方国是在三郡之外的独立势力。汉平南越和秦定岭南一样,都是岭南融入中华一体进程中最重要历史事件。汉平南越之后,土著方国不复存在,全部划入汉朝郡县范围内,中央派遣官吏直接管理。岭南汉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在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上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墓葬资料最为丰富。

两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墓。高等级大墓主要集中在南海、合浦、郁林和苍梧四郡郡治所在地,这四郡治所今天已经有明确发现,分别在现今广东广州和广西的合浦、贵港和梧州。秦朝时期开凿的通往岭南的“新道”,有多条路线(见《史记·南越列传》)。或沿湘江过湘桂走廊,进入广西全州、兴安,或从湖南道县、江华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贺州、钟山,或从湖南郴州入广东韶关、乐昌,这几条道路沿线均有较多汉墓发现。岭南地区至今发掘的 3000 多座汉墓中,广西有 2000 多座,广东有 1000 多座。^②

岭南汉墓的分期多以广州汉墓为参照。广州汉墓分布集中,年代序列完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根据墓葬形制和陶器的演变等划分为五期,其中西汉墓分为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二期。^③ 前期为南越国时期,中期以后属于汉朝郡县直接统治时期,中间还有短暂的新莽时期。

西汉中期的墓葬数量较少,规模不大,随葬品也不丰富,应与平定南越国的战争以及战后汉朝对原南越国地区较为严厉的统治措施有关。这个时期汉墓的陶器组合中,作为“礼制”象征的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组合大为减少,这既是由于周秦时期礼制的弱化,也与岭南地区融入大一统的汉文化密切相关。在有较多铜器随葬的大墓中,铜、铁兵器之类都很少,应是“(铁器)在汉平南越以后出现过短暂的停滞”^④所致。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的墓葬,在合浦、广州、贵港等地均有较多发现,总量大大超

① 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9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 483 页。

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8 页。

出前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昭宣中兴”后的繁荣。东汉早期汉墓在岭南的分布范围已经很广泛,岭南地区 20 多个市县均有发现。东汉中期墓葬的数量发现最多,发掘总数超过了 1000 座。^①

岭南汉墓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点。西汉早中期,以仿铜陶礼器为代表的中原器物在岭南地区广泛出现,青铜器和玉器等也多与中原文化有渊源关系。岭南汉文化的形成是在西汉中晚期,表现为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和岭北汉墓风格已经趋同,但地方特点突出,可以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② 岭南地区在受到中原文化持续影响的同时,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断,汉墓中也明显存在楚、闽越、滇等在内的文化因素。

五、岭南地区纳入中华一体过程的阶段、特点和影响

岭南地区纳入中华一体的内在驱动力是农业文明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根本因素是农业社会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化”到历史时期的汉化莫不如此。中国作为世界六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华夏文明和族群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发展,在可能的地理范围之内,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明综合体,也就是今天所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③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不断发展延续,提升了整个东亚区域的文明素质,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明的力量。

岭南地处中国农业起源核心区的外围,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秦汉时期。这三个阶段都可以从文化、人群和政治三个侧面去观察和理解。认清这三个阶段,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祖国南疆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转型。主要体现在距今 5000 年前后开始的龙山化,典型表现是良渚文化的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地带的文化和人群突破固有范围,向岭南进发。

第二个阶段:青铜时代百越社会的形成。岭南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已经完成越化,成为土著,西瓯和骆越堪为代表。这个时期,中国核心地带随着青铜文明的兴起,文化更化,形成了以“礼制”为代表的全新的中华文明。随着西周的统一,礼制中国的文化和人群向周边四夷之地扩散,岭南地区也是泽被之地。百越文化中出现大量的中原因素,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个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转型动

① 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1 页。

②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 年第 3 期。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21—23 页。

因主要还是来自文化传播,鲜见人群迁徙,越人南迁是一特例。

第三个阶段:秦汉时期中央王权政治的发展。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中原王朝逐渐征服和统治了岭南,虽然南越国时期有所反复,但终于难以抵挡历史潮流,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之后,岭南完全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权统治得以确立,百越在保留自己特点的基础上全面与中央王朝趋于统一,完成了岭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在政治和文化逐渐完成了中华一体的过程,和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在这个过程中都有鲜明的表现。通观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阶段性与连续性。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岭南纳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从考古学角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连续不断,岭南纳入中华的趋势从未扭转。中国核心区的农业文化、农业社会、农业族群,从点到线再到面,逐渐进入岭南,成为主流文化。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连续性”,都有具备岭南特征的表现。岭南地区史前时代的长期积淀、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结构、西汉前期的政治组织形式等因素,都持续发挥了作用。

第二,过程长期而激烈,融合来之不易。岭南地区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斗争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晓锦文化和石峡文化石器武器的精良、青铜时代武器制造业的发达,以及秦汉平定岭南战争的激烈,都反映出不同时期族群融合曾有过的激烈碰撞。中华文化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到理想的中国,再到现实的中国,不仅是文化上的相似和观念上的认同,最终必然归结到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经过多次统一战争的洗礼,以地方政权形态或土著族群形态表现出的文化体系受到强烈冲击甚至不复存在,岭南地区在文化性质上已经转变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

第三,双向奔赴,美美与共。岭南纳入中华一体的进程中,虽然避免不开暴力冲突,但和平演进仍是主流。我们看到,类似世界上某些地区种族灭绝式的征服,在岭南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在新石器时代,农业族群和狩猎采集人群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局面。在青铜时代,岭南发展出了自己的强大方国。在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演变成为次生越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岭南社会历史的多个阶段,都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先进的生产力、制度和文化是共同体形成的保证,文化和族群的认同,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石。华夏文明的先进性,对于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直都为土著族群所认可。即使在割据时期,不论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器物,还是南越王墓的墓葬形制、南越国宫署的布局等,都表现出与中央王朝高度的趋同性,可见南越政权对中原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第四,岭南纳入中华一体是一个文化和族群相交相融的文明创新过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交汇,族群交融,形成多姿多彩、多元结构的中华文化。岭南社会 and 人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双方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交叠融合,合之又合。各方联姻,形成新的族群,在体质人类学和基因研究上都有丰富的证据。北方移民与百越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①至于文化上的融合,在汉文化主导下形成汉越融合的新文化,在考古发现中更是常态,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具体体现。

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岭南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南疆”。岭南处在中国农业起源核心区的外围,也是华夏文化圈基础轮廓的外圈,经过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不断的改造和统一过程,岭南终于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南疆,成为中华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汉家气象。从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考虑,这是中国农业文明扩张的合理范围。王明珂认为华夏边缘至迟在东汉就已经成型,东汉疆域与今天中国大陆汉族主要分布区有着惊人重叠,“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生态地理上的边缘。……中国人一直有效地维持着这形成于汉代的族群地理边缘”。^②现今中国的疆域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统一性与多样性兼具的文化结构乃至东亚汉文化圈的维系,即是边远地区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遗产。岭南从一个非农业区到纳入帝国版图,并改造为繁荣的农业区,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岭南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巨大的海洋性成分。中华文明传统上是建立在内陆农业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大陆性突出,和海洋的联系较弱,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岭南是中国文化中海洋性的主要来源。岭南与海洋的联系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苏秉琦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③岭南文化为中华文明贡献了主要的海洋成分,是其巨大的历史贡献。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越人集团主要有南越、西瓯、骆越,具有海洋性和土著性特征,与大陆农业文化有重要区别。20世纪50年代,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④等文章中,将中国文化分成西部华夏的“大陆文化”和东部沿海蛮夷的“海洋文化”两大类,前者的

① 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09页。

③ 苏秉琦:《序——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1954年第10期。

代表是“金玉、车马、衣冠”,后者的代表是“珠贝、舟楫、文身”。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并重为经济特征,华夏人群(东亚蒙古人种)与百越(南亚蒙古人种)在此地带接触、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海洋文化在此地带分野、交汇,海洋性和大陆性形成了有机结合。中华文化中的海洋性成分,主要来自南方海洋族群,这是岭南百越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的一部分,历史意义重大。中国所在的世界地理区位,使其对外海上交通和跨文化交往主要朝向东海与南海两个方向发展。南海航线因近岸航行条件佳、经停港市多、跨海及跨区域范围广等优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古到今确实存在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阶段性、波浪式发展过程,这种阶段性与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是密切相关的,恰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相对应,分别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表现出经济方式转变带来的社会面貌和文化交往上的变革。南海丝绸之路从肇始到兴盛,正是岭南纳入中华一体过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李冉)

dissemination Tibetan texts, particularly in the Nyingma school's terma (hidden treasure) literature, as a subduer and transformer of local deities. He fulfils the core function of integrating indigenous religious deities into the Buddhist pantheon. The construction of Padmasambhava's critical role in Tibetan texts began with 10th-century Dunhuang manuscripts, was further refined in the 12th-century Upper Terma of the Nyingma school, and fully developed in the 14th-century Northern Terma (Byang gter), ultimately establishing the key paradigm of "Padmasambhava subjugating local deities." The second wave of Tibetan Buddhism's spread to Mongolia, initiated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Third Dalai Lama, similarly portrays Padmasambhava in Mongolian-authored Tibetan texts as the subduer of indigenous Mongolian deities. Meanwhile, the Third Dalai Lama's role as a subduer and witness of vows is modeled after Padmasambhava. As Professor Shen Weirong has n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follows a "threefold progression" (*lam rim gsum*): the first stage, beginning in the Tibetan Yarlung Dyansty period, marks Buddhism's localization in Tibet; the second stage, during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volves its dissemination among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admasambhava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first stage" of Tibetan Buddhism's localization in Tibet. In the "second stage", Mongolia's adapta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demonstrates that Mongol rulers not only inherited doctrinal teachings but also strategically adopted Tibetan textual and sociopolitical frameworks as critical reference points.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m, localization, Sinicization, Padmasambhava, mountain deities

History and Culture

"Imagined Geography" 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in Modern Western Discourse

PENG Wen-bi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G Chuan (Yunnan University) (45)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postcolonial theory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has sparked significant discussion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compared to its reception in Western anthropology and other Chinese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Said's critique of "Orientalism" has not generated widespread debate within Chinese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key concepts of *Orientalism*, particularly the notions of "imagined geography" and "travel,"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Western knowledge of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 It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ree discourse models-those of the West,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and the southwestern local context-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uthwest discourse."

Keywords: Orientalism, Imagined Geography, Travel, Western Discours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ingnan Region into the Chinese Unified Process

CHEN Hong-b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65)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ingnan region into the unified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Neolithic, the Bronze Age, and the Qin-Han period. These three stages can be observed and understood from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cultur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Among these, the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hold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The process of Lingnan's integration into Chinese culture began around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with innovations during the Bronze Age, and was finally completed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is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in Lingna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ore region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indigenous factors of the Lingnan societ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nrich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a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which multiple group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racted, exchanged and mingled, and it has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ingnan Region, Chinese Unification, Frontier Archae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Northern Frontier Regime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O Xian-h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84)

Abstract: Ancient China maintained vast territories for a long perio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be examined not only through the temporal dimens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convergence areas, combining agrarian-pastoral economie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cavalry, were important regional powers in ancient China. Before the Middle Ages, the northwest frontier convergence are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China's historical unification. In the modern era, the northeast frontier convergence areas also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China's unification. The long-term role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convergence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is a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 prominent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Northern Frontier Convergence Areas, Military Advantage, Geopolitics, Unification, decisive role

I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Guarding the Four Barbarians” and “Not Laboring for the Barbarians”: An Examination of Ancient China's Border Control Practices

CHENG Yi-nong (Peking University) (101)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Tianxia Order,” “China” was the core of the “Tianxia” and held inherent superiority, while the “Four Barbarians” were on the periphery, and the “border” served as a measure to separate the two. Because the goal was to keep the “Four Barbarians” outside the “border,” dynasties hoped to “guard the Four Barbarians” on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wished to avoid “laboring China for the Barbarians.” Based on this, every dynast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ontrolling the “border,” but they typically adopted various “control” measures for areas beyond the “Nine Provinces” or “China” itself, and rarely established counties or districts in those areas. By the